

【思潮与流派】

左联解散以后： 北平作家协会与左翼文学运动考论

王翠艳

【摘要】北平作家协会系以北平左联为基础改组而成的文艺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体，也是左翼文学在救亡语境下实现组织转型与实践推进的重要成果。协会赓续了左联时期以无产阶级为领导核心、以鲁迅为精神领袖的思想基点，经由强调“斗争性”到提倡“联合性”的运动方式的改变，实现了对分散的左翼文学力量的重组和对中间立场的知识分子的吸纳。同时，借助《北平新报·文艺周报》《通俗文学》《联合文学》《京报·泥土文艺》四份会刊及“通俗文学运动”，协会也呼应了哲学领域的“新启蒙运动”并将左联时期的“文学大众化”推进到新的阶段。北平作家协会的相关探索，既呈现了左联解散后左翼文学运动新的演进路径，也为我们理解左翼文学向延安文学与抗日文学的过渡提供了有意义的参照。

【作者简介】王翠艳，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文化传播学院。

【原文出处】《文艺研究》(京)，2023.4.61~75

【基金项目】本文为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北京地区左翼文学运动研究”(批准号:20ZDA15)成果。

左联解散是中国现代文学史尤其是左翼文学运动史上的大事，围绕这一事件发生的国际国内背景、具体时间以及主要过程等问题，学界不乏详细精审的考辨与论析，但相伴而生的另一向度的问题则常被忽略——左联解散之后呢？左联解散是不是意味着中国左翼文学运动的终结？要回答这一问题，有必要重返历史语境，对左联组织与成员的转型轨迹以及左联时期的思想主张是否走向消解等问题进行具体考察。

1936年6月和11月成立于上海和北平的中国文艺家协会和北平作家协会，是分别以上海和北平地区的左联组织^①为基础改造、扩展而成的文艺界抗日统一战线团体，除去少数成员由于理念不同或有特殊政治任务未加入外，大多数左联成员均转入相应团体。其中，由于上海左翼文艺界在左联解散及“两个口号”论争问题上的思想分歧和人事纷争，中国文艺家协会的命运不幸被鲁迅言中：“其中热心者不多，大抵多数是敷衍……我看是就要消沈，或变化

的。”^②协会成立宣言的起草者及发起人之一的茅盾也承认，“这个协会成立之后，实际上并没有活动……虽然简章上规定理事会下设五个部，但并未组建起来”^③。在此情形下，北平作家协会便成为我们考察左联解散后左翼文学界“转型”情况的重要个案。

由于受卢沟桥事变影响而存续时间较短等原因，北平作家协会一直是学界较少关注的领域。1979年8月出版的《新文学史料》第4期重新刊载的郭虹、辛波的《北平作家协会成立大会速写》(原载1936年12月2日出版的《时代文化》第1卷第2期)一文，是其尘封四十年后第一次出现在学界视野。此后，除当事人的零星回忆外，党史著作《中国共产党河北历史》及封世辉的论文《也谈北平作协执委与会刊》亦对其成立概况和历史功绩有所论述：前者认为该会“实现了北方左联组织及斗争形式的根本转变，促成了北方左翼文艺运动的新高涨”^④；后者总结其乃“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较为重要的一个组织”，“‘七七’事变前夕全国各地的抗日救国大联合的文艺组

织中最有作为的组织”^⑤。受制于作者择定的研究视角(前者致力于呈现中共对左翼文化运动的领导,后者则试图批驳王名衡《关于北方左联的几点更正和补充》),两者都仅仅简略介绍协会的大致情况,没有涉及内部机制。一些较为关键的问题,如作为中共文化统一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协会依据什么样的组织原则建立并开展活动?战线扩大后“先前的友和敌,都站在同一阵图”^⑥,是否会产生新的问题?协会如何处理左联的既定使命与新的历史任务之间的关系?换言之,回到本文开头的问题,左联时期的理论主张在协会的文学实践中是被消解了还是得到了延续?带着上述问题,本文以协会四大会刊《北平新报·文艺周报》《通俗文学》《联合文学》《京报·泥土文艺》为依据,结合当时的报刊报道及当事人相关回忆,梳理与考辨1936年左联解散到1937年卢沟桥事变前北平作家协会的文学活动。希望在对前述问题做出符合历史真实的回答的同时,为理解左翼文学运动向抗日救亡文学及延安解放区文学的演进提供参照。

一、“不变”的领导核心与“变化”的组织原则

北平左联的解散和北平作家协会的成立,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化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地处危机重重、民族矛盾严峻的华北核心地带,北平地区以左翼知识分子为中心的统一战线工作并未遭遇太大的阻力。但是,对于建立统一战线是否就一定要解散左联一事,左翼阵营内部的意见并不一致。据北平左联发起者及初期和后期领导成员之一、北平作家协会筹备人且以最高票(与曹靖华并列)当选执委、常委的孙席珍回忆:

当时内部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扩大文艺界统一战线是必要的,但左联应该继续存在,从中起核心作用,以免领导权旁落。另一种意见认为,左联存在与否只是一个形式问题,在文艺界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作家当然该起领导作用和核心作用,革命群众肯定会支持我们的;倘若仍然保留左联的组织机构,可能会引起外界作家的顾虑,怀疑左翼作家想操纵阵线,利用他们来达到自己的企图。两种意见

相持不下,最后决定通过陈伯达向党请示,北方局文委指示说,应与中国左联采取同一步调。我们本着服从党的领导、下级服从上级的原则,也就自动宣告结束。^⑦

北方局文委的指示表明,保留“左联的组织结构”与维护“无产阶级作家的领导作用和核心作用”是两个可以分开的命题,解散左联并不意味着无产阶级作家领导核心地位的丧失。据孙席珍在稍早于上文的《关于北方左联的事情》中回忆,北方局的指示系“口头指示”,他们“经过讨论,决定依照指示,北方左联也自动解散,但不对外宣布”^⑧。然而,在现存档案材料中,我们可以看到1936年8月5日中央在给北方局和河北省的信中对此事的明确指示:“为了扩大左联社联的工作范围,发展他们的天才,取得公开或半公开的机会,我们提议,把左联社联象上海一样的公开宣布取消,参加到其他广泛的群众组织中去,以扩大与加强统一战线的工作,把左联社联的分子尽量吸收入党……请多多注意吸收在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强有力的干部到各级的领导机关。”^⑨究竟是孙席珍记忆有误,还是中央对北方局“不对外宣布”左联解散有不同意见而在指示信中特意纠正,目前已难以查考,但无论哪种说法都足以证明解散北平左联是党的组织决定。当时中共北平市委隶属北方局和河北省委(两者“一套人马,两块牌子”^⑩),北方局宣传部长即为北平左翼文化界的活跃人物、“新启蒙运动”的发起者陈伯达。他不仅以笔名“周金”列名北平作家协会,同时也与协会核心人物吴承仕、孙席珍、齐燕铭、管舒予同属一个中共特别小组(陈伯达担任小组领导人及与中共北方局的联系人)^⑪,中央指示精神通过陈伯达转至上述成员的渠道是畅通的。由此可见,解散左联组织只是建立文化界统一战线的具体策略,其成员被“吸收入党”并“参加到其他广泛的群众组织中去”,带来的结果是党对统一战线领导的加强而不是相反。这一点,正是北平作家协会有可能沿袭左联时期的思想主张与历史使命的组织基础。

组织问题之外还有另一关键问题,即北平作家

协会也与中国文艺家协会一样面临如何争取左翼文坛精神领袖鲁迅支持的问题。据孙席珍回忆,协会成立前他“与曹靖华商量,特约鲁迅、郭沫若、茅盾等为大会名誉主席团,并由靖华写信给鲁迅,请他作一书面发言”^⑩。1936年5月3日鲁迅致曹靖华信中“大会要几句话,俟见毛兄时一商再说”^⑪即指此事。“俟见毛兄时一商再说”,可能是鲁迅的婉拒之辞,也可能是其真实意图。一方面,如其在此前致曹靖华信中对上海的作家协会(后改称中国文艺家协会)持审慎的怀疑态度^⑫,鲁迅对北平作家协会也会有相同的立场;另一方面,联系信中“谁甘为此辈自私者所统一呢,要弄得一团糟的”,又可见出鲁迅对上海作家协会的微词实有特殊的人事缘由。在此情形下,如果北平作家协会的组织者恰是鲁迅始终信赖的曹靖华,也许他会有不同的看法——从其在“俟见毛兄时一商再说”之后接着写“我们也准备垂帘听政,不过不是莲小姐,而是别个了。南方人没有北方的直爽,办事较难,但想试试看”^⑬可以看出,鲁迅对北方(北平)和南方(上海)作家协会的态度是存在差异的。更为重要的是,由这段话中的“也”字可以推测,曹靖华在来信中表露过“莲小姐”(即左联)在协会中依旧“垂帘听政”的意思,这是无产阶级作家领导核心作用的重要保证。在北平作家协会成立的11月份,鲁迅已去世一个多月,他对北平作家协会究竟持何种意见,也就成了历史之谜,但这丝毫不影响北平作家协会以鲁迅为精神领袖的事实。在协会四大会刊之一《京报·泥土文艺》的“创刊词”中,作者“齐水”特意写道:“本刊现在把费了鲁迅先生心力所起的‘泥土’这名字袭用过来,一方面固在纪念鲁迅先生终身作为泥土培植文艺的苦心,一方面也藉此表示本刊‘不过是泥土,希望能从这里开出一点文艺的花来’——不过倘使不能开花,那就长出一些野草来也好。”^⑭无论是“泥土”的名称还是“野草”的典故,都足见该刊是以鲁迅精神为旗帜的。

尽管在以无产阶级作家为领导核心和以鲁迅为精神领袖两个基点上延续了左联时期的思想基础,但北平作家协会在具体组织方式上与北平左联存在

相当大的差异。北平左联具有“第二政党”性质,大部分时候属于秘密活动的“政治团体”,而北平作家协会则属于公开的文化团体,其组织与活动情况亦常见诸各类媒体。北平的《京报》《北平新报》《时代文化》《实报半月刊》《燕大周刊》,上海的《社会生活》《光明》等报刊都曾对它的筹备和成立情况进行过报道。《时代文化》所载《北平文化界最近的动态》曾这样介绍其筹备工作:

联合广大群众结成抗敌救亡的统一战线,是我们民族解放的唯一出路,也是我们广大群众的共同认识……北平本来负有中国文化城的名望,在“五四”以至“一二九”,都有它的光荣历史,在所谓“知识分子”方面,今年六七月间,有多数前进作家,着手组织作家协会,已开过筹备会数次,并推定筹备委员,现正征求多数作家,不久即能成立。^⑮

这则短讯蕴藏的信息相当丰富,它不仅明确交代了北平作家协会成立的目标系“联合广大群众结成抗敌救亡的统一战线”,同时,“无产阶级作家”“革命作家”的称谓也被“知识分子”中的“前进作家”的提法悄然取代。这意味着北方左联成立时所宣称的“政治斗争成了全国普遍的现象,文化斗争无疑的必须走着同样的步骤”^⑯,将会以另一种面貌展示它们的一致性。果然,在1936年11月22日发表的《北平作家协会成立宣言》中,北平左联时期主张“根据自己的阶级立场,我们要无情的批判一切反动阶级的文艺理论”^⑰的“斗争性”,已经被“在这伟大的民族解放运动的洪流中,我们,文艺从业者,要在‘联合战线’的号召之下团结起来,作为这伟大运动的一环。凡是不甘心作亡国奴和汉奸的作家们,纵然文艺上的主张不同,我们也认为同是一条战线上的战友”^⑱的“联合性”所取代。党史专家张太原用“从‘反对一切’到‘联合一切’”^⑲来概括1936年后左翼知识分子对待非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立场变化,这一变化同样也是北平作家协会成立的思想背景。北平左联刊物《榴火文艺》第2期更名为《联合文学》,并从第3期开始成为“北平作家协会会刊”之一,反映的也是这一趋向。

二、有限度的“联合”与分散的左翼文学力量的聚合

作为“‘左联’的扩大”和“文艺界抗日救亡的统一战线组织”^②，北平作家协会的人员构成有着广泛的代表性。依据《北平作家协会成立宣言》所附名录（这份名录可能是会员名单，也可能仅为发起人名单），北平作家协会至少有会员89名^③，其中容纳了“左”“中”“右”不同政治立场的知识分子，表明北平左翼文化界响应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积极纠正左联时期“关门主义和左倾宗派主义的错误”，并自觉在“在行动上主动去团结中间和偏右一点的作家”^④。中共中央在1936年8月5日写给北方局及河北省委的指示信中曾经明示：“我们非常欢迎省委更集中力量创办一个精锐的公开的抗日统一战线的，如《大众生活》相似的刊物的企图，我们希望这一刊物能够多吸收名记者，政论家，大学教授，各界及各党派的重要人参加，只要他们是主张抗日的。”^⑤这一精神实际上也是北平作家协会吸纳会员的原则。孙席珍晚年曾经回忆，“在平的文艺工作者绝大多数都加入了，只有鸳鸯派张恨水、新月派沈从文等个别人士依然站在阵线外面，周作人也谢绝参加”^⑥。这一说法整体上是符合史实的。将杨丙辰、顾颉刚、陆侃如、冯沅君四人置于名单之首的署名方式，也充分证明了左翼文化界“为了纠正宗派主义倾向，力图扩大阵线”^⑦的努力与成果。杨丙辰时任北京大学德文系主任，在德语文学教学、翻译、研究领域成绩卓著；顾颉刚为燕京大学教授、古史辨学派的创始人，在北平史学界享有极高地位；陆侃如时任燕京大学国文系主任，是广有影响的古典文学专家；冯沅君是饮誉文坛的新文学第一代女作家和声望日隆的学者。四人学贯中西并与现实政治保持着相当距离，属于原来左翼文艺界并无好感的学院派人士，他们列名北平作家协会，对于左翼文化阵营的扩大与“文艺界统一战线”的建立具有标志性意义。

北平作家协会不止实现了北平左联未能实现的向文坛前辈寻求认同与合作的愿望，同时完成的还有其计划许久的与其他流派青年作家的结盟。随着

1933年后北平文坛的重振与文化语境的变迁，与端木蕻良、吴组缃、王西彦等左翼作家同时崛起的，还有一批年轻的学院派作家，如卞之琳、李广田、金克木、南星等人。他们或者本身即为“京派”代表作家，或者文风与“京派”相近，既在写作旨趣、作品风格方面与左翼作家存在较大差异，同时也有着不同于左翼作家的发表空间和人际关系网络。无论是诗境幽深、富于思辨色彩的卞之琳，诗风醇厚、蕴藉深远的李广田，还是意象古雅、理趣丰盈的金克木，静穆悠远、田园气息浓郁的南星，他们追慕的都是“纯诗”的审美境界，与强调政治性、斗争性的左翼文学阵营保持着相当的距离。争取、吸纳这些青年作家入会，使北平作家协会在具有更广泛的代表性的同时，也加强了对文坛新生力量的吸纳。

除名录外，协会执委的选举结果也体现了广泛的代表性。据《北平作家协会成立大会速写》载，成立大会当天选出的十一名正式执委中，“孙席珍三十三票，曹靖华三十三票，高滔三十二票，王余杞二十八票，管舒予二十一票，李何林十七票，杨丙辰十六票，顾颉刚十六票，李辉英十五票，澎岛十五票，谭丕模十四票”，左翼人士八人（孙席珍、曹靖华、王余杞、管舒予、李何林、李辉英、澎岛、谭丕模），“中间人士”三人（高滔、杨丙辰、顾颉刚）；候补执委中“杨刚十三票，陆侃如十二票，冯沅君八票，紫扬七票，王西彦七票”^⑧，左翼人士三人（杨刚、紫扬、王西彦），“中间人士”两人（陆侃如、冯沅君）。左翼人士与“中间人士”的比例与协会中各方人士的比例相对应，具有充分的代表性，再次表明了北平左翼文化阵营与各界人士对话、合作的诚意。

然而，联合的初衷虽好，但也会产生新的问题，1937年4月7日出版的《北平新报·文艺周报》即刊出了如下启事：

前有本会会员孙荪全，介绍顾颉刚、吴世昌、朱宝昌、连士升、张秀亚、郑侃懿等各先生加入本会，顷闻该会员事先并未征得各位被介绍人之同意，殊属非是。本会前筹备委员会疏于检察，亦觉非常遗憾。兹特郑重声明，顾先生等并未正式参加本会，诸

希公鉴。^②

这段话语气委婉,但也明白显露了顾颉刚等六人与协会的疏离。在协会成立当天选出的11名执委中,顾颉刚以16票排名第八当选为执委,该执委名单及协会成立的消息在1936年11月23日出版的《北平新报》、1936年12月出版的《时代文化》、1937年1月出版的《光明》等报刊均有报道;此外,1936年11月28日燕京大学出版的《燕大周刊》,还全文登载了北平作家协会宣言及89名成员名单(顾颉刚在该名单中排名第二)。顾颉刚为燕京大学教师,吴世昌、朱宝昌、连士升、郑侃嫒为燕京大学学生,即便他们均未注意到《北平新报》《时代文化》等左翼报刊,但在报刊数量有限、大学师生普遍对本校校刊保持关注的1936年,作为燕京大学师生,五人均未看到《燕大周刊》的概率是极低的。在此种情形下,迟至1937年4月(名单公布四个多月后)才有启事申明“并未正式参加本会”,令人觉得不合常理。较之启事中所称六人事先并未同意入会,其一度入会后又因协会内部矛盾而主动或被动退出似乎更近情理一些。

顾颉刚在“九一八”事变后以燕京大学为依托创办“三户书社”(取“楚非三户,亡秦必楚”之意),并于1934年7月将其更名为“通俗读物编刊社”。该社“以通俗文学稍尽唤起民众之责任”^③为使命,以民间流行的鼓词、戏本、画册等形式编印、宣传抗战故事。此外,该社还在1936年创办了致力于“把知识传给大众”“增加这民族的力量”使之“可以从各种的压迫之下求解放与生存”^④的《大众知识》,李一非、杨刚、柳林、伍石夫等左翼青年均为该刊重要的编辑或发行力量。因为与左翼文学阵营存在这样的契合,顾颉刚最初“默许”加入北平作家协会的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至于四个多月后协会又以介绍人“未征得各位被介绍人之同意”为由,声明“顾先生等并未正式参加本会”,可能是顾颉刚受到来自政治的压力,但根本的原因,还在于其与左翼阵营在价值理念与思想立场上的分歧。

北平作家协会成立时鲁迅已经去世,但这并不影响其与北平左联一样视鲁迅为精神领袖的事实,

而顾颉刚与鲁迅之间的矛盾早已是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公案,两者私人关系交恶的背后,反映的是知识分子自我定位与价值理念的对立。正如王富仁在《鲁迅与顾颉刚》中指出的,顾颉刚所代表的是知识分子的某种“精英意识”,这种意识是“在一个群体中将‘个人’‘个性’突出出来,使其凌驾在这个群体的其他人之上的一种意识形式,这种意识形式将不同的人放置在上下等级的不同阶梯上,从而也破坏了彼此在平等的基础上相互同情、相互理解的可能”^⑤,其“天然的优越感和更优越的社会地位,使他们的人生感受与中华民族最广大的中下层社会群众的人生感受截然不同”^⑥;而鲁迅及左翼文学的意义,则恰恰是“把大量被排斥在国家政治、经济法权保护圈之外的社会底层知识分子的社会人生感受带入了中国的新文化与中国的新文学”^⑦，“它是建立在对人、特别是那些受苦受难的平民百姓的真诚同情和关怀的基础之上的,不仅仅是为了个人的成名成家”^⑧。这就必然导致顾颉刚与北平作家协会在思想理念乃至人事关系上发生齟齬,双方站在同一阵营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吴世昌、朱宝昌、连士升、郑侃嫒均为顾颉刚在燕京大学的得意门生,他们与顾颉刚同进退也是顺理成章之事。这个插曲也表明,左翼知识分子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价值立场、文化观念乃至行为方式上难以调和的矛盾与分歧,使得北平作家协会“以共同团结的力量造成广大的联合”^⑨的初衷甚好,但实践起来困难重重。

北平作家协会与左翼阵营外的自由知识分子对话、沟通的努力虽未能完全取得预期效果,但它达成了自北方左联成立以来始终未能实现的北方各派左翼文学力量的联合^⑩。要理解这一联合的意义,有必要大致回顾北平左翼运动的历史:1930年北方左联初创时虽然有“北京的各文艺团体都要解散,成员全部参加一个中国‘左联’的北平分盟”^⑪的设想,但并未实现。正如端木蕻良所批评的,北平左联是“一个低能的契构”,“没有力量吸收同路人”,因而“各社团依旧按照自由的轨道发展,没有一贯的神经中枢”^⑫。在此情形下,“向往革命又热衷文学的青年们

以自发结社的形式参与(与)左翼文学运动成为了一种常态”^⑩。尖锐社、冰流社、北国社等社团的独立存在,也充分证明端木蕻良的指责并非空穴来风。1933年七八月间,北方左联有过“以《科学新闻》打底子,把几个小型刊物合并在一起,出版一个大型的文艺刊物”^⑪的设想,但随着1933年8月国民党宪兵三团镇压力度的增强,北平左翼力量遭遇重创,联合出版大型刊物的计划就此搁置。此后,虽有吴承仕以中国大学为中心创办的《文史》《盍旦》以及《北辰报》《京报》《北平新报》《觉今日报》等报纸副刊支撑了左翼文艺的发展,但左翼文学力量的联合已在事实上难以实现。“一二·九”运动前后,在中共北平市委领导下,北平左翼文学活动陆续恢复,但由于北平市委多次遭到破坏,频繁改组(据当时的左联负责人陈落回忆,仅1936年上半年北平市委即“变动了四个书记”^⑫),左翼文学力量依旧呈分散状态:以白晓光、路一等人为核心的文学导报社,以吴承仕、齐燕铭、管舒予、孙席珍、曹靖华、陈伯达等人为代表的《时代文化》群体,以谷景生、谷牧、魏伯、碧野、亚苏等人为核心的泡沫—浪花社,以刘春、伍石夫、秦川等人为核心的榴火文艺社,以及中国大学的文艺青年协会、清华大学的国防文艺社(后改组为清华文学会)、燕京大学的“十二九”文艺社等校园文学社团,虽发展活跃但各自为政,依旧缺乏核心凝聚力。

另外,1936年初北平左联解散后,北平左翼文艺界已有过多种联合的努力。比如,1936年4月出版的《火星》杂志刊载了一则题为“北平文艺界郊野联欢会记盛”的消息,消息称“‘十二九’文艺社,国防文艺社,大学艺文社,白水社,熔炉社,泡沫社,浪兰(花)社,文学导报社,盍旦社和令丁社”等团体将“组织一北平文艺青年联合会”^⑬;1936年5月出版的《每月文学》创刊号也注明该刊集合了文史社、北国社、文学杂志社、尖锐社、创作与批评社、当代文学社、嘘社等团体,意在“形成北方有力团体之大汇聚”^⑭。但这些尝试,或因联合过于松散难以为继,或由于政治原因遭封禁,北平左翼文学界试图形成一个大型文艺社团组织的努力始终未能实现。在这样的背景下,北

平作家协会的成立,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根据《北平作家协会成立宣言》所附名单及四大会刊的核心作者,可以确定北平作家协会至少汇聚了以下几方面的左翼文学力量:第一,1930—1933年8月北方左联时期的骨干作家,如孙席珍、杨刚、紫扬、澎岛、王余杞、江篱等;第二,1933年8月北方左联遭遇重创后以中国大学为中心成长起来的一批左翼知识分子,如齐燕铭、管舒予(张致祥)、周金(陈伯达)、王西彦、李寒谷、鲁方明(余修)、张凝、张柎等;第三,1935年北平左联恢复期以柳林(王劲秋)、魏东明、张晋媛、魏伯、林火(韩冰野)等为代表的泡沫—浪花社的成员;第四,“一二·九”运动中成长起来的、以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学生为主体的一批左翼文学青年,如罗白(赵德尊)、王昭琛(王瑶)、王孙(王逊)、高楚泽(高承志)、莫兰(王作民)、郑契嘉、赵荣声(任天马)、牛文颖、王名衡(天蓝)等;第五,以刘春、伍石夫、秦川为代表的榴火文艺社的成员——虽然宣言所附名单中没有他们的名字,但由榴火文艺社社刊《联合文学》自第3期开始被确立为协会会刊之一,可知榴火文艺社也是该会的团体会员。此外,协会还吸纳了已在文坛卓有声名的白晓光(马加)、李辉英等东北流亡作家以及初在文坛崭露头角的严文井、刘白羽等年轻作家,谭丕谟、温涛等原本属于“教联”或是木刻协会的左翼知识分子也成为协会的重要成员。这些新老左翼文学力量的大聚合,意味着北平作家协会中蕴蓄了左翼文学运动新的可能。

三、“通俗文学运动”与“文学大众化”的推进

北平作家协会不仅实现了对分散的左翼文学力量的聚合,同时也赓续、深化了左联时期的理论主张。检视《北平新报·文艺周报》《通俗文学》《联合文学》《京报·泥土文艺》等四份会刊,可以发现协会对当时文化界的各种思潮均给予了积极的关注与回应。比如,杨述的长篇论文《论当前文化领域上的新运动》,在正面论析陈伯达、艾思奇等左翼文化人士提出的“新启蒙运动”以及文学领域“两个口号”论争时,对王芸生、胡建昌等中间人士提出的“现代化运动”“全民族抗敌民主的大觉醒运动”都进行了客观

的评判,即便是对各种“反‘左翼’文化的运动”,也平心静气地列举其表现形式并给予了理性的回应,充分体现出左翼文艺界希望“中国文艺工作者与广大的读者群”“协心同力坚决地在民族统一抗日战线的完成底下来开展中国‘文学的新生’”^⑧的“联合”精神。这一点是我们在回顾北平作家协会的历史功绩时不能忽略的。但我们又不得不承认,在诚意“联合”的同时,真正能够代表北平作家协会的思想价值与实践意义的,还是其对“通俗文学运动”的提倡。

“通俗文学运动”是依托北平作家协会聚结的左翼文学力量推出的一场文学大众化运动。尽管这一运动目前还未进入学界视野,但就其组织发动、理论主张、写作实践与具体影响,它都有理由被视为20世纪30年代继左联的三场“文学大众化”讨论之后的第四场“文学大众化”运动。该运动中的“通俗文学”指的不是通常意义上具有较强的商业性与娱乐消遣性的武侠或言情小说,而是指“内容现实,文字通俗,篇幅短小”的“报告文学,地方通讯,生活记录,杂文,诗歌,小调,独幕剧,文艺短论,短篇创作”^⑨,为了便于大众接受,它“部分的采用旧的形式——演义,鼓词,民歌小调”等^⑩。通俗文学运动在1937年初华北战前语境中被提出,本身即承载了抗日救亡的意识形态内容,而其深层逻辑则是民族危机促进了知识分子与大众、精英文学与通俗文学的交流与互动。

“我们需要一个通俗文学运动”^⑪的口号最早由1937年2月8日出版的北平作家协会首份会刊《北平新报·文艺周报》创刊号明确提出。此后,22日出版的《北平新报·文艺周报》第3期集中刊发了《让我们打马加鞭,去努力通俗文学运动》《文学要通俗化》《通俗文学的建立》《杂谈通俗文学》《通俗文学要用来写什么来写》等五篇专论,对通俗文学运动的意义及开展方式提出了系统的理论主张。1937年3月,北平作家协会另一会刊直接以“通俗文学”命名,编者在第1期《编后》中明确提出“《通俗文学》的使命”,“是把‘少数’知识分子所写,所读的‘为了大众’的文学,更近(进)一步,给大众读,也就是让大众写,而成为‘大众自己的’东西”^⑫,对通俗文学的提倡由此转入

创作实践层面。至此,通俗文学运动以北平作家协会会刊为载体,既有思想动员与理论阐发,又有创作实践和组织架构,将左联时期的文艺大众化工作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首先,通俗文学运动建构了文学大众化与抗日救亡之间的密切关系,并与文化界正在进行的新启蒙运动形成呼应,充分发挥了文艺的战时宣传与组织动员作用。这一点,也是左联时期确立的将文艺作为宣传利器的传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发展。

区别于左联时期“文学大众化”讨论更多瞩目于如何利用文艺唤醒大众对无产阶级革命的认同等问题,通俗文学运动的主要目的,则是启迪民众的救亡图存和国家认同意识,这一点使北平作家协会的文学探索成为抗战前后左翼文学“阶级话语”向“民族话语”^⑬转化的一个典型例证。正如胡易夫《文学要通俗化》指出:“‘通俗化’的文学,是使一般大众都易了解而传诵的——并能直接促进其对社会对国家的观念,鼓励其爱国家爱社会的情绪……今日中国文坛正在一致的摒弃享乐颓废的文学,要求‘国防文学’‘大众文学’的产生,因而对于文体的‘通俗化’尤应给予充分的注意。”^⑭通俗的形式与抗战的内容的结合,是这一运动的核心指归。基于这一宗旨,协会对全国文化界正在进行的新启蒙运动给予了积极的回应,并自觉将通俗文学运动作为新启蒙运动的“文学一翼”来推进。

新启蒙运动肇始于1936年9月陈伯达在上海《读书生活》发表的《哲学的国防动员——新哲学者的自己批判和关于新启蒙运动的建议》,是一场“有着共产党人组织力量的推动”^⑮，“马克思主义者发起并倡导、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以及一些持中间路线的文化人共同参加的思想文化联合运动”^⑯。该运动以“新启蒙”引导下的“爱国”“理性”“救亡”“民主”思想为旗帜,致力于建立“抗日救国而共赴国难”的统一战线,其影响很快从哲学发展到文化界其他领域。1937年4月出版的《通俗文学》第2期,刊发了柳林的《“新启蒙运动”与“通俗文学”》。文章提出“‘文学界新启蒙运动’的实践也就是‘通俗文学运动’”,“‘文

学界的新启蒙运动’，这必须文艺工作者制作‘通俗’的作品，交给更多数的大众读者”⁵⁵的论点，自觉建构起通俗文学运动与新启蒙运动的联系。柳林是该时期北平左翼文学界最重要的理论工作者，“两个口号”论争中代表北平左翼文学界表态的《国防文学的理论与实践》《当前文学运动的两个口号》《人民大众向文学的一个要求》等文均出自其笔下，而据方汉奇主编的《中国新闻事业编年史》记载，他同时也是《通俗文学》的编辑出版人⁵⁶，该刊创刊号的首篇文章，即为其《给文艺爱好者的信》。这些证据表明，将通俗文学运动命名为“‘文学界新启蒙运动’的实践”的提法，应该不是柳林的个人见解，而是代表了《通俗文学》杂志乃至北平作家协会的集体立场。

果然，在1936年5月出版的《通俗文学》第3期，专门开设了“纪念五四与新启蒙运动特辑”，收录舒予（张致祥）《五四与新启蒙运动》、丁非（孙席珍）《纪念五四》、若士《五四杂谈》、柳林《新启蒙运动的实践》等四篇论文。由于舒予、丁非北平作家协会常委的身份以及柳林的主编身份，这组文章实际上也是北平作家协会和《通俗文学》的“官方声音”，通俗文学运动作为“文学界新启蒙运动”的定位再次得到确证。丁非在文章中直接提出“我们的旗帜便是新启蒙运动。当着目前民族大破灭的危机，为了唤起广大人民的抗敌和民主的觉醒，为了组织救亡民主的大联合，应该大规模地把这个新启蒙运动开展起来。这运动在文艺上的表现，便是通俗文学运动”⁵⁶。而柳林则在概括新启蒙运动的实质即“要全国一切参加或同情抗敌联合战线的文化工作者，集中力量有组织地去进行一个有计划的文化运动：反日，反汉奸，反对‘愚昧’‘迷信’‘盲从’‘独断’”后，将“集团研究”与“集体写作”的“习作会”界定为“新启蒙运动的实践”⁵⁶。这组文章表明，通俗文学运动既依托了新启蒙运动在全国的广泛影响，同时也对哲学和世界观领域的新启蒙运动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二者相互促进，其影响所及，一直持续到延安时期。

其次，北平作家协会沿着左联时期的文艺大众化路径，探索了大众化的具体方案。在知识分子与

大众的关系、旧形式利用等层面，通俗文学运动都为左翼文艺向延安文艺的过渡提供了可资参照的经验（尽管只是众多可供参照的经验之一），在革命文艺发展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

将文学作为发动民众投身抗日救亡的利器，通俗文学运动与左联时期的文艺大众化思路一脉相承，但在实践方面，其目标更为具体，针对性也更强。与许多左联杂志服务于左翼知识分子之间的交流不同，《通俗文学》显然更看重沟通知识分子与大众的作用。早在创刊前，创办者即指出“办《通俗文学》是希望把它贡献给小城市市民及农民们”⁵⁶。杂志创刊后，魏伯又在《通俗文学的路》中将杂志定位为“做一个小小的喇叭筒，传出救亡的呼声”，“在国防的前线上，做一个忠实的战士，一个传令兵，一个小号兵”。杂志的目标，是“有一天打开《通俗文学》一看，里边尽是些劳动大众用自己的话写出的自己的哭诉和怒吼！有逃亡的图画，有黑山白水间的抗战，有奸贼的凶狠与卑污，有剥削者的奸笑，有农夫的锄头，有学徒的眼泪……那便才算成功了”⁵⁶。从知识分子“写大众”“为大众写”，到大众“用自己的话”“写自己”，通俗文学运动既继承了左联时期工农通信运动的有效经验，又横向吸收了苏区工农兵写作的实践成果，对左翼文学的“大众化”探索做出了有力的推进。

如果说左联时期的文学大众化探索还有某种程度的“启蒙”与“化大众”倾向，在经过三次大讨论之后发生的通俗文学运动，则已逐步由“启蒙大众”的“化大众”向“适应大众”的“大众化”转型。柳林在《“新启蒙运动”与“通俗文学”》中提出“唯有‘通俗’的作品才是大众的粮食”，“文艺写作者也就要和大众有共同的意志，和大众在一起生活，才能得到他们的要求，写出适合他们的口味的作品”⁵⁶，这些不只是认识层面的口号，同时也是实践层面的具体行动。

早在创立《通俗文学》专门发表适合大众口味的作品前，北平作家协会五常委之一的管舒予已在《北平新报·文艺周报》发表《杂谈通俗文学》，对通俗文学运动的具体路径做了规划。文章提出了“大众生

活及语言的利用”“新文字运动”“部分采用旧形式”三条方案,除“新文字运动”为当时习见的观点外,另外两点都颇具针对性和概括力。在“大众生活及语言的利用”部分,管舒予指出,“大众的生活,蕴蓄着丰富的宝藏,我们要用掘发和提取,这才是医疗过去文学的软骨症和贫血症的唯一方法……如果要体现大众,就必须尽量融化他们的语言,来作为体现的工具,坐在屋里,绞尽脑汁的修辞造句,是和他们的生活内容格格不入的”,要实现“大众化”,就“必须使自己的生活和大众的生活打成一片,自己能真实的正确的了解大众的生活”^⑥。这样的表述虽不及毛泽东1942年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中提出的大众化“就是我们的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而要打成一片,就应当认真学习群众的语言”^⑦那样深刻、精炼,但思想理路有着内在的一致性。这种跨时空的契合既证实了《讲话》作为“‘五四’以来革命新文艺发展的系统的理论概括和总结”的集大成性^⑧,也从一个侧面表明,通俗文学运动的理论探索,极可能为左翼文艺向延安文艺的演进积蓄了条件(当然,只是众多条件之一)。

知识分子与大众的关系是左翼文学中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早在1932年的文艺大众化讨论中,瞿秋白已经指出,“不是群众应该给文学家服务,而是文学家应当给群众服务。不要只想群众来捧角,来请普洛文学导师指导,而要去向群众唱出‘莲花落’讨几个铜板来生活,受受群众的教训”^⑨。但有研究者指出,类似思想在左联时期尚未形成“专项议题”,只是“瞿秋白等个别人”的“批评”意见。左联时期的知识分子普遍“以大众的启蒙者、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灌输者身份来倡导文艺大众化”,而“知识分子自身的大众化以及知识分子与大众关系的转换要求”与“文艺大众化主张一同被正式提出”,则直至延安时期的“民族形式”论争方始确立^⑩。作为有着共同的倡导者(陈伯达、艾思奇)且前后接续的两场运动,“民族形式”论争与新启蒙运动在思想背景、理论主张与运动方式上都存在紧密联系^⑪,这必然决定了作

为“文学界新启蒙运动”的通俗文学运动与“民族形式”论争在某些内在精神上的一致性。两者都重视知识分子与大众的结合,其内部都在发生由知识分子对大众的“启蒙”向适应大众、向大众学习的方向位移。所不同的是,在通俗文学运动中,这一位移还刚刚开启,如《通俗文学》编者所言,“如果要‘货真价实’的‘通俗文学’的十足货色。我们还不敢答应。只是在一面锻炼自己,教育自己”^⑫;而到了延安时期,则“通过政党命令收束一端,要求知识分子全面进行思想改造和身份转换”^⑬,完成了这一位移。前者是不自觉的、隐隐约约的意识,后者则是自觉借助行政命令展开的实践。

此外,管舒予在《杂谈通俗文学》中还对通俗文学创作中的采用旧形式问题进行了探讨。他指出“通俗文学目前应当部分的采用旧的形式——演义,鼓词,民歌小调……当然在内容上应该避免低级趣味,而灌输以新的意识”,其原因是:“第一,这类旧形式是接近大众的最方便的工具;第二,这类旧形式的内容注重在情节的热闹穿插,一般大众比较容易接受,而不感到生硬;第三,这也是通俗化写作最好的学习,因为在这里欧化的辞藻都使用不上了。”^⑭“采用旧的形式”“灌输以新的意识”的思路,无疑继承了左联时期大众化讨论中提出的“新内容”与“旧形式”并行不悖的辩证思想;而力避欧化词藻、将“演义,鼓词,民歌小调”等民间文艺纳入创作资源的策略,则吸收了苏区活报剧、标语、歌谣创作的经验,进一步弥合了精英文学与民间通俗文学之间的分野。翻开《通俗文学》,我们不难看到大量以民歌小调形式写成的通俗易懂的抗战“新诗歌”,如化用孟姜女调的《满州游击队歌》:“浩浩荡荡黑龙江,巍峨长白山:我祖我宗住此地,相传千百年。日本铁蹄踏进来,炮火声连天,尸骨如山血成河,想起真悲惨!”^⑮还有《送丈夫打日本》的男女对唱:

女唱:送我丈夫当义勇军,勇敢向前打日本,不要留恋我一人,国亡家破苦难忍。哎哟!哎哟!哎哟!我的夫,打日本最光荣。

男唱:多谢爱妻一片心,送我前线打敌人,誓死

杀敌争光荣,哎哟!哎哟!哎哟!打日本最光荣。

女唱:送我丈夫当义勇军,打倒汉奸和日本,坚决作战莫回头,家庭不要你挂心。哎哟!哎哟!哎哟!我的夫,家庭不要你挂心。^①

这些文本表明,在北平作家协会的文学实践中,自新文化运动开启的文学现代化方向,已由全面吸收世界文化转化为借鉴本土民间资源和探索大众喜闻乐见的新文艺形式——“旧形式”向“民族形式”的转化已是呼之欲出。由陈伯达1938年在延安发表的《论文化运动中的民族传统》一文,可以明显看到“民族形式”论争中的某些思想,沿袭自通俗文学运动的相关探索。在文章中,作者不仅明确提到了新启蒙运动,同时也指出“利用旧形式”正是“新启蒙运动的主要特点之一”。在总结“去年的新启蒙运动中,不少文化工作者”已经“初步提到了关于利于旧形式、接受固有文化的优秀传统和需要具体地理解自己民族各方面的历史”等诸问题之后,文章进一步指出,“毫无疑问的,由于抗战动员的需要,利用旧形式的问题最近已更进一步地引起了全文化界的注意,而且最近正有不少人已开始被牵动到这方面来工作。这个潮流将是不可遏止的,现在就是要推动这个工作成为最普遍的文化运动”^②。这一论断清楚地呈现了彼时正在酝酿中的“民族形式”论争对通俗文学运动的承继关系。虽然文中并没有使用“通俗文学运动”概念,但无论是运动倡导者一直将通俗文学运动与“文学界新启蒙运动”划等号的做法,还是“利用旧形式”恰是通俗文学运动的核心观点之一的事实,都坐实了在通俗文学运动中已经蕴含的向“民族形式”论争转化的趋势与可能。

最后,协会充分吸收了左联时期“工农通信运动”的经验,通过创办《通俗文学》、开办文学讲话以及加强编读往来、成立“通俗习作会”等方式,将“文学大众化”落实到团体组织层面,推动了“大众”由“读者”向“作者”的革命性转化。

《通俗文学》的编者一再申明,他们“出这小刊物的最大意义,是想叫一般人都能够看的东西,能够推行到偏僻的地方,学生,工人,农民,店员,兵士……

的手里”^③;他们“最大的想头,是希望那些脸上一脸煤灰的,拿着大锄锄地的,在商店里天天在柜台上摸着算盘的,在街头拉着车的”以及“那些内地整年拿二三十块钱的教员、职员们”,“都能抽点功夫来读,抽点功夫来写”。刊物的努力目标是“进一步地跟读者的生活连(联)系起来,里面应该有他们心坎中‘要说的话’,用他们自己‘口头上的话’说出来;使他们觉到这是自己的东西”^④。在运动发起者的认识中,“为了把文学交给千万的大众”,“广泛的文艺团体的组织”和“‘通俗’的文学作品的创造”是同等重要、“不可分离”的,“惟有通过广大的有组织的集团的力量才能把‘通俗文学’广播出去”,“尤其必要的是有计划地普遍地成立各式各样文艺团体,彼此密切地联络起来”^⑤,所以他们普遍对文艺团体的组织投入了相当的精力。《通俗文学》第1期《编后》即特意强调“愿意和各地的文艺团体互动,合作;尤其是青年们自己组织的‘文艺研究会’‘通俗文学研究会’,或设立‘通俗文学分社’。互相讨论问题,交换刊物,稿件等。同样,也欢迎各个读者的来信,讨论文学的以至救亡的各种问题”,而其最终目标,则是“全部采用读者的作品,获得最广大的读者”^⑥。

为了实现上述目标,《通俗文学》也采取了多种具有针对性的措施,如开办“语文讲话”,以浅显通俗的语言向大众普及写作方法等。通过一系列目标清晰的组织实践,通俗文学运动力图实现的从“写给大众看”到“大众自己写”的转化已初见成效。虽然较之苏区、延安乃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大规模工农兵创作,这些实践还只是小规模尝试,但它从一个微观的“切口”呈现了新的写作主体生成的历史横断面,也显示了知识分子力图与大众结合的真实努力。

结语

北平作家协会的实践表明,左翼文学运动并未随着左联的解散戛然而止。由于中共党组织领导核心的保留和旧有左翼文艺力量的聚集,左翼文学不仅在北平作家协会的系列实践中得到深化与拓展,同时还伴随救亡思潮获得了更大范围的影响与传播。随着卢沟桥事变的爆发,协会会员先后离平,四

大会刊也一并夭亡于战乱,但通俗文学运动对“文学大众化”与“抗日救亡”、“知识分子”与“大众”结合的探索以及从民间文艺中寻绎创作资源的实践,都在相当程度上推动了抗战时期的文学建设。新启蒙运动发起者陈伯达作为延安“民族形式”论争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更使作为“文学界新启蒙运动”的通俗文学运动汇入了延安文艺的历史巨流。

除了理论倡导,北平作家协会成员也以其他方式参与了延安的文艺建设。齐燕铭因为合作创作《逼上梁山》《三打祝家庄》而成为“推陈出新”的“京剧革命”的“勇敢的先驱”^①。协会会刊之一《联合文学》的主编天蓝则分别在1938年7月和1943年6月成为延安鲁艺文学系的学生和教员。他因为《队长骑马去了》(《文艺战线》1939年第1卷第3期)等作品成为歌颂工农兵的代表诗人,同时也以诗集《预言》(桂林南天出版社1942年版)入选“七月诗丛”,成为七月派的代表诗人。两种身份统一于“我随历史的战斗行进;我,从单个人/走向人群”^②的自白,谢冕认为该诗显示了“七月”诗人“体认自己作为诗人的使命”时,“更乐于承认自己属于历史,属于社会,属于民众”^③的姿态。事实上,这也是所有从北平走向延安的一代青年知识分子的心声,北平作家协会的作家,无疑是其中的典型。

当然,除了陈伯达、齐燕铭、天蓝,我们还可以列出一串更长的名字,比如马加、严文井以及与协会渊源颇深的公木、袁勃、秦川、李雷、黄既等人,他们在延安的文学事业都始自北平时期的左翼文学活动。因而,无论是从运动组织的角度,还是从理论探索和具体创作的层面,北平作家协会都在左翼文学向延安文学的演进过程中发挥了过渡性的作用。尽管它只是延安众多文学资源中不起眼的支流,但对这一支流的发掘,或将为主流问题的研究提供新的思路。最后,还须提及的是,相当比例的北平作家协会会员在抗战期间告别了文学事业而成为专门的政治宣传人才和职业革命家,这是他们在文学与革命之间做出的另一向度的选择,也是左翼文学运动的另一意义所在。

注释:

①关于北平地区左翼作家联盟的名称,历史文献中有“北方左翼作家联盟”“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北方部”(简称“北方左联”)及“北平左翼作家联盟”“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北平分盟”(简称“北平左联”)等提法。其中,“北方左联”除包括北平地区外,还包括天津、保定等地,1933年之后该称谓逐渐被“北平左联”取代。由于本文讨论的是北平地区的左翼文学现象,故在泛指该联盟时称为“北平左联”,而在特指1930-1933年的相关文学现象时则称为“北方左联”。

②鲁迅:《360523致曹靖华》,《鲁迅全集》第1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02页。

③茅盾:《左联的解散和“两个口号”的论争》,《我走过的道路》下,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66页。

④中共河北省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河北历史》第1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21年版,第263页。

⑤封世辉:《也谈北平作协执委与会刊》,《新文学史料》1993年第3期。

⑥⑭鲁迅:《360423致曹靖华》,《鲁迅全集》第14卷,第81页,第81页。

⑦孙席珍:《再谈北方左联》,《左联回忆录》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519页。

⑧⑫⑳㉑孙席珍:《关于北方左联的事情》,《左联回忆录》下,第507页,第507页,第507页,第507页。

⑨㉒《中央给北方局及河北省委的指示信(一九三六年八月五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1936-1938),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65-66页,第66页。

⑩马京波、王翠主编:《刘少奇生平研究资料》,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19页。

⑪叶永烈:《陈伯达传》,作家出版社1993年版,第118页。

⑬⑮鲁迅:《360503致曹靖华》,《鲁迅全集》第14卷,第86页,第86页。

⑯齐水:《创刊词》,《京报·泥土文艺》第16期,1937年7月9日。

⑰《北平文化界最近的动态》,《时代文化》第1卷第1期,1936年11月。

⑱《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北方部成立宣言草稿》,余贵华主编:《中共中央北方局文件汇集(一九二七一九二八一九三〇一九三二)》,中央档案馆内部资料1992年版,第321-322页。

⑲《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北方部理论纲领》,《中共中央北方局文件汇集(一九二七一九二八一九三〇一九三二)》,第319页。

⑳㉓㉖《北平作家协会成立宣言》，《燕大周刊》第7卷第16期，1936年11月28日。

㉑张太原：《从“反对一切”到“联合一切”：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左翼知识分子文化态度的变化》，《中共党史研究》2013年第1期。

㉒王西彦：《回忆北平作家协会及其他》，《北方左翼文化运动资料汇编》，北京出版社1991年版，第456页。

㉓㉔陈落：《“北平左联”结束前后》，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会址纪念馆、上海鲁迅纪念馆编：《左联纪念集1930—1990》，百家出版社1990年版，第211页，第214页。

㉕郭虹、辛波：《北京作家协会成立大会速写》，《时代文化》第1卷第2期，1936年12月。

㉖《北平作家协会启事》，《北平新报·文艺周报》第9期，1937年4月7日。

㉗顾颉刚：《致教育部函稿（1935年7月30日）》，《顾颉刚书信集》卷三，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5页。

㉘《本刊的名称内容和立场》，《大众知识》第1卷第4期，1936年10月。

㉙王富仁：《精英意识对顾颉刚之影响》，《鲁迅与顾颉刚》，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第265页。

㉚㉛王富仁：《鲁迅的“文化山”》，《鲁迅与顾颉刚》，第247页，第245页。

㉜王富仁：《广大的忧郁》，《端木蕻良》，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第41页。

㉝当然，这一实现也是相对而言的，北平文艺青年协会即是由于北平作家协会未能吸纳部分左翼文艺青年而另行组建的左翼文艺团体。

㉞刘尊棋：《关于“北平左联”的回忆》，《左联纪念集1930—1990》，第168页。

㉟螺旋（端木蕻良）：《打击左联右倾机会主义》，《科学新闻》第2号，1933年7月1日。

㊱马俊江：《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北平小报与故都革命文艺青年——以〈觉今日报·文艺地带〉为线索的历史考察》，北京大学2009年博士学位论文。

㊲端木蕻良：《回忆“北方左联”片段》，《左联纪念集1930—1990》，第187页。

㊳流金：《北平文艺界郊野联欢会记盛》，《火星》第1卷第2期，1936年4月。

㊴《本刊筹备出版时几封有关系的信》，《每月文学》第1期，1936年5月。

㊵《编后》，《联合文学》第3期，1937年6月。

㊶㊷㊸《编后》，《通俗文学》第1期，1937年3月。

㊹㊺㊻（管）舒予：《杂谈通俗文学》，《北平新报·文艺周报》1937年2月22日。

㊼《北平新报·文艺周报》1937年2月8日。

㊽参见张武军：《从阶级话语到民族话语：抗战与左翼文学话语转型》，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2页。

㊾胡易夫：《文学要通俗化》，《北平新报·文艺周报》1937年2月22日。

㊿㉀参见毕海：《延安对“五四”新文艺的重申及其意义——以“民族形式”论争为中心》，《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3年第9期。

㉁周全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术史》，广东人民出版社20184F版，第166页。

㉂㉃㉄柳林：《“新启蒙运动”与“通俗文学”》，《通俗文学》第2期，1937年4月。

㉅方汉奇：《中国新闻事业编年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684页。

㉆丁非（孙席珍）：《纪念五四》，《通俗文学》第3期，1937年5月。

㉇柳林：《新启蒙运动的实践》，《通俗文学》第3期，1937年5月。

㉈《编后》，《北平新报·文艺周报》1937年2月8日。

㉉㊱魏伯：《通俗文学的路》，《通俗文学》第2期，1937年4月。

㊲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论文艺》，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8页。

㊳李希凡：《毛泽东文艺思想的贡献》，《李希凡文集》第4卷，东方出版中心2014年版，第29页。

㊴史铁儿（瞿秋白）：《普洛大众文艺的现实问题》，《文学》第1卷第1期，1932年4月25日。

㊵㊶石凤珍：《左翼文艺大众化讨论与延安文艺大众化运动》，《文学评论》2007年第3期。

㊷萧参：《满洲游击队歌》，《通俗文学》第3期，1937年5月。

㊸《送丈夫打日本》，《通俗文学》第3期，1937年5月。

㊹陈伯达：《论文化运动中的民族传统》，《解放》第46期，1938年7月23日。

㊺《本刊启事》，《通俗文学》第1期，1937年3月。

㊻周扬：《〈逼上梁山〉序》，《周扬近作》，作家出版社1985年版，第38页。

㊼天蓝（王名衡）：《无题》，《七月》第4卷第4期，1939年12月。

㊽谢冕：《新世纪的太阳：二十世纪中国诗潮》，时代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201页。